

宣文辅治：元朝统一西藏前后阿里地区的 政教关系研究

黄博

内容提要：十三世纪初藏传佛教噶举派诸支从卫藏西进阿里，止贡噶举派僧众较早取得优势地位并获得阿里地区诸政权的支持，随后阻挠主巴派噶举派的传教活动，却遭到普兰政权的严厉申斥。同时，蔡巴噶举派在几位高僧的持续努力下成为普兰王室的应供喇嘛。另一方面，此时蒙古崛起，阿里地区可能是最早接触蒙古势力的西藏地方。十三世纪中期开始，蒙古结合萨迦派之势，统一卫藏，在西进阿里之时，遭到古格联合噶举派之力的抵制，在这一过程中双方运用了基本一致的政教关系模式展开竞争，最后古格突然衰落，阿里与卫藏一起统一于元朝的治下。

从十三世纪，大蒙古国与元朝的兴起，使中国中央政府的影响力第一次全面深入地进入西藏社会，元朝中央通过扶植萨迦教派政权主理藏政，实现了对西藏的有效管理。关于这一过程的研究，过去多视西藏为一整体来讨论，事实上元朝的统一事业对西藏社会内部的区域政治结构也影响深远，在这一过程中蒙古与萨迦派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宗教影响重新整合西藏众多的地方势力，最后无论是教派政权还是世俗政权都被纳入到这一新的统治秩序之中。正是这在一时期的军事与宗教的双重压力之下，具有悠久王权传统、长期割据一隅的阿里地方诸政权才最终被纳入到西藏政治之下的。本文尝试以

西藏阿里区域社会为中心,通过揭示西藏内部区域社会的政教关系演进历程,加深我们对元朝统一西藏的策略和程度的理解。

一、朕之地也:十三世纪以来噶举派诸支的西进及普兰王室的因应

在蒙古势力进入西藏前夕,阿里地区的政教格局可谓丰富多彩,在政治上是三围分立,整个区域在十二世后形成由阿里王朝若干分支政权分而治之的局面,当时阿里地区较大的割据政权有古格、拉达克、普兰、亚泽等,而古格这时一度还分裂为南北朝。而在宗教上则基本上成为兴起于卫藏地区的噶举派诸支的天下。其中止贡噶举派是十三世纪前期在阿里地区政治和宗教上最具优势的噶举派支系,它不但是较早地大举进入西藏西部活动的教派,且在阿里的神山圣湖地区建立起规模庞大的传教基地,并在十三世纪初期得到阿里诸政权在政治上的大力支持。无论古格、普兰和拉达克,止贡派都有着独占鳌头的优势地位,在阿里王朝史记忆中被誉爲“生命之树”¹。但这一时期阿里地区的宗教力量也相当多元,除止贡派外,同属噶举派支系的蔡巴派与主巴派都在阿里都有一席之地。阿里地区的自九世纪后期吐蕃王朝崩溃以后,就一直处于赞普后裔的割据统治之下,吐蕃的世俗王权传统在这里得以延续。因此尽管各教派都有排他性,但各政权往往各派并用,将教派势力纳入到自己的权力结构中,并不许教派势力挑战王权的权威,因此尽管止贡派在阿里因为一度抢占了先机而占据优势,但也不允许他一枝独秀,这一点在普兰王处理主巴噶举派进入阿里后的遭遇中显得尤为突出。

主巴派是噶举派的分支教派之一,他和止贡派还同出于帕竹噶举系统。该派渊源于帕木竹巴(པག་མོ་བླ་པ་རྩོ་རྒྱལ་པོ། 1110—1170年)的弟子林热·白玛多吉(ལྷིང་རས་པད་མ་རྩོ་རྩེ།),而真正的创立者则是林热巴(1128—1188年)的弟子藏巴嘉热·益西多吉(གཙང་པ་རྒྱ་རས་ཡེ་ཤེས་རྩོ་རྩེ།)。藏巴嘉热(1161—1211年)于1205年在拉萨附近建立本派的根本寺院——主寺(འབྲུག།),因此该派被称为主巴噶举派²。尽管主巴派对阿里的关注较早,但在阿里地区的弘法事业真正起步却较晚,据说帕木竹巴临终前曾向弟子交待一定要开拓神山圣湖地区的弘法事业,当时接受遗命的两大弟子,就是止贡派的创始人止贡巴·仁

1 关于这一时期及稍前的阿里地区政治格局与宗教概况已另文撰述,在此从略。参见黄博:《三围分立:11世纪前后阿里王朝的政治格局与政权分化》,《中国藏学》,2012(3):35-42;黄博:《生命之树:西藏阿里王朝与止贡噶举派早期政教关系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2(6):168-177。

2 克珠群佩:《主巴噶举派早期历史简论》,《西藏研究》,2003(3):53-54。

钦贝（འབྲི་གུང་པ་རིན་ཆེན་དཔལ། 1143—1217 年）和主巴派的奠基人林热巴³。止贡巴接命后迅速地让弟子们组织起一支庞大的僧团西进，驻锡阿里的神山圣湖地区；但林热巴接受的这一祖师遗愿直到他的徒孙郭仓巴·贡布多吉（རྒོད་ཚང་པ་མགོན་པོ་རྩེ་ཞེ།）之时才得以实现。

郭仓巴（1189—1258 年），出生于山南洛扎地区，他是藏巴嘉热的高徒，1226 年在后藏的协噶尔创建郭仓寺，传法收徒，形成主巴派中的上主巴支系⁴。他在创建郭仓寺之前曾有一段到一些圣地修证佛法的经历。据《青史》记述，林热巴圆寂后的第二年，他前往喀曲、岗底斯山和那烂陀寺等处安住专修，在喀曲住了三年⁵，时年二十五岁，然后在岗底斯山和那烂陀寺住了四年，时年二十九岁⁶。藏巴嘉热圆寂于 1211 年，也就是说他在 1212 年前往喀曲，在喀曲呆了三年，即 1214 年左右抵达冈底斯山一带修行，继而离开冈底斯山穿越阿里地区进入克什米尔，再到印度那烂陀寺，这一系列的活动一共用了四年时间。

然而此时的阿里宗教派系的权势格局对晚到的主巴派来说已相当不利，郭仓巴到达神山圣湖地区之时，冈底斯山一带早已是止贡派的天下。止贡派从 1191 年起就开始了持续了西进运动，特别是 1215 年止贡派组织了一支据说有 5 万多人组成的以古雅冈巴（རྩུ་ཡ་སྒང་པ་）为首的西进僧团进驻冈底斯山，随后在岗仁波齐峰南麓建立了止贡派阿里教团总部——远声寺（རྒྱང་གྲགས་དགོན་），并设置“多增”（རྩི་ཞེ་འཛིན་པ་）一职统率在阿里的僧众，古雅冈巴成为第一任多增。因此郭仓巴传抵达岗底山后，止贡派不肯为他提供修炼的山洞，他只好在冈底斯山的空森佛塔度过了一个夏季。他原计划在冈底斯山和玛旁雍措住上三年，并想好好享用一下这里的神圣资源，结果控制了神山圣湖地区的止贡派僧团竟然不准他在这里过冬⁷。看来郭仓巴甫一入山，就遭到了当时已在阿里人多众势的止贡派的压制，尽管《郭仓巴传》记载了他与在岗底斯山修行的止贡派高僧森格益西斗法，展示出神入化的法术，似乎比止贡派略胜一筹⁸。然而这个斗法胜利的故事并不能改变主巴派在神山圣湖地区的弱势地位，他只能另觅圣地修行，这恐怕也最终促成了他的印度那烂陀寺之行。

3 ངོ་ཤོན་མཆོག་བསྟན་འཛིན། གངས་རིའི་གནས་བཤད་ཤེལ་དཀར་མེ་ལོང་། ལྷ་ས། བོད་མཛུ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 1992: ཤ 42-43.

4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141-142。

5 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403。

6 《青史》，2003：406。

7 སངས་བྱུས་དར་པོ། རྒོད་ཚང་པའི་རྩམ་ཐར། ཟི་ལིང་། མཆོ་སྟོ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1993: ཤ 60-63.

8 རྒོད་ཚང་པའི་རྩམ་ཐར། 1993: ཤ 65.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止贡派试图独占阿里宗教领域的行为引起普兰政权的极强烈反应，虽然当时止贡派已获得包括普兰政权在内的阿里诸政权的大力支持，但对王权而言，止贡派的欲图独尊的行为却必须加以警告，一向对止贡派给予巨大支持的普兰王喇钦达查（ཁྲ་ཆེན་ལྷག་ཙེ）在得知郭仓巴的遭遇后，竟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讲话：

自在大成就者林热巴乃帕木竹巴弟子辈中之殊胜修法者，伊之声名远播，东至恒河皆闻其名。其弟子法主藏巴嘉热亦为证得自在之修法者，其徒众皆小谨慎，行止极佳，伊等自修本门教法，住于朕之山中证悟大法，尔止贡派众人竟欲将伊等逐走，尔等欲何为焉！地者，朕之地也；山者，朕之山也！⁹

在此之前止贡派已与古格、拉达克和普兰等阿里政权建立了广泛的供施关系，据《冈底斯山志》载，“至尊多增与古格法王扎西德赞，塘域王拉钦俄朱衮，普兰王喇钦达查赤巴、南德衮父子结供施之缘，弘法伟业遍及阿里三围。”¹⁰ 然而普兰王喇钦达查在处理止贡派与主巴派的争端中的态度表明，早期教派势力在阿里地区的发展形态同卫藏迥然有别，尽管世俗王权一方面需要利用教派来稳定统治，但另一方面世俗统治者并不沉溺于某一教派，而使王权为教权服务，恰恰相反，这一时期的教派力量必须为政权服务，此时的普兰王仍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气概。为了保持王权在权力对比上的优势，统治者自然不愿看到一派独大的局面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普兰政权对止贡派试图排挤它派，惟我独尊的作法加以阻止的原因，地是我的地，山是我的山，便是王权对教派势力最旗帜鲜明的权力宣示。

此外，差不多跟止贡派同时，蔡巴噶举派的一些高僧也开始进入西部地区，只不过他们不像止贡派那样由教派总部组织的集体行为而是个人的自发行为。蔡巴噶举派是达布噶举的四大教派之一，该派创始人向蔡巴（ཁང་ཆེན་པལ་ 1123—1194 年）于 1175 年在拉萨蔡谿卡贵族噶尔家族的支持下在拉萨东面的蔡地方创建了蔡巴寺，开宗立派，他创派之后不择手段地发展本派势力，甚至不惜以武力公开抢掠资财，蔡巴派从一开始就既是一个教派，又是一个地方军政实体¹¹。据《红史》记载，蔡巴派很早就有僧徒进入阿里地区修练，最早到神山圣湖地区的是如托巴·达喀囊贡日巴（རུ་ཐོག་པ་རྟ་སྐ་ལྷན་སྐྱེས་རལ་པ་）。

9 ཁྲ་ཆེན་པལ་ལྷག་ཙེ 1993: 96.

10 གངས་རིའི་གནས་ལའང་ཤེལ་དཀར་ཐེ་ཁོང་། 1992: 952.

11 克珠群佩：《简述蔡巴噶举派的兴衰》，《西藏研究》，2000（1）：90-91。

他是向蔡巴四大弟子之一的班丹拉秋喀巴（དཔལ་ལྷན་ལྷ་ཐུག་མཁར་པ། 1144—1215 年）之徒，班丹拉秋喀巴曾经担任过蔡巴寺的主持，他于 1193 年创建拉秋寺，因此得名拉秋喀巴。如托巴拜拉秋喀巴为师，取法名为桑杰沃，他因倡建墨竹如托寺而得名如托巴。他在向蔡巴死后依止堆恰宾巴到衮斯雪山（即冈底斯山）和六山寨修行，期间创建了达喀寺（དཀ་ཤི），这可能是蔡巴派在西部地区最早的据点，他任达喀寺主持期间，使蔡巴派的影响力扩展到普兰、亚泽一带，《红史》上称述其功业有“宏扬奴日、香布壤多波（布壤即普兰）和罗卧等地的利他事业”等语¹²。

如托巴除了是最早进入阿里地区传教的高僧之外，他还为阿里地区培养出一位杰出的佛教人才。阿里地区自后弘期初期以后很少有人能够在佛教史上有所表现，藏传佛教中知名的高僧大德中有很多是来自东部边地多康地区的，却几乎没有来自阿里地区的。如托巴的弟子智慧者寨巴（རྟོགས་ལྷན་མཛོས་པ། 1165—1244 年）可谓阿里地区在史册上屈指可数的高僧之一。《红史》上对他的情况有详细的记载：

智慧者寨巴（རྟོགས་ལྷན་མཛོས་པ།）生于阿里玛盘雍错湖边的萨沃赖漾穷喀如地方，其父亲为麦贵巴衮的次子玉荣拉京，据说他是吉热巴的转世。在拉堆达喀地方由堪布祖介瓦等人授比丘戒，起法名寨巴宁波，他与达喀地方送礼的作伴，背着屋脊宝瓶到卫地方去寻找佛法，当到达墨竹岗普新寺庙时，把屋脊宝瓶并到智慧如托巴之手，祈请教法，后在此修行三年。在一个晚上梦见一个叫玛热秋格瓦的女人，让他随从香仁波且学法，到茅蓬中修行。故他急忙为西面突然显现的佛像敬献曼遮，并祈祷，因而产生优于其以前的一切感受。此后，他到北方的祁宗普山洞中，不下山坐静十三年。木猪年（1215 年）倡建萨龙寺，他一生中有许多智慧弟子，住持僧团三十年，七十九岁龙年（1244 年）逝世。¹³

寨巴宁波出生于阿里地区的神山圣湖地区，然后前往卫藏地区学有所在，他创建的萨龙寺后来由他的弟弟和侄子相继接掌，主持该寺教务数十年，在蔡巴派里形成一个萨龙宗系，如此成就在后弘期初期以后的阿里地区出生的僧人中可谓凤毛麟角。如托巴在

12 参见蔡巴·贡噶多吉著、陈庆英等译、东嘎·洛桑赤列校注：《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113-115。

13 《红史》，2002：113-114。

阿里地区的开创性弘法活动虽然声名远播，但他主要依靠个人的力量进行，所以未能与阿里地区的诸政权建立起政治联系。使蔡巴噶举派同阿里地区地方政权建立起比较亲密的政教合作关系的是如托巴的继承人达磨索南（དམ་མོ་སངས་ལྷ་མོ་），达磨索南是如托巴晚年选择的达喀寺的继任者：

此后，他在仁波且（指向蔡巴）法座之前，召集僧众说：“我建有一座小寺，由我的侄子觉色为首的三四名圣者住守。”此后，觉色、仓杜瓦钦波、萨丹宗巴、多丹达索（即达磨索南的缩写）等人来到此寺，刚满二个月，觉色卒。此时如托巴年迈，故对多丹达索说：“你住在此寺，作利益众生之事吧！”¹⁴

达磨索南继承达喀寺后，继续推进蔡巴派在阿里地区的传教事业，也许是鉴于主巴派受挫的教训，他前往阿里地区开拓时，并不以占据具有圣地意义的神山圣湖地区为目标，而是直接与普兰朝廷建立联系，将本派的教法引入到普兰王室中，开启了蔡巴派与普兰王室的政教合作，据《丹巴却列参坚传》载：

其往神山圣湖也，遂与数弟子至普兰乞食。其时，伊之事业，普兰王亦有所闻。是时，王久病，苦不堪忍，行将离世。乃为王灌顶，痛稍舒，未几竟痊愈矣。王大喜，赐普兰之田地甚夥。复赐水磨十七，并将齐卓寺、喀巴色吉恰吉寺、却垅寺、贡果松寺、洛俄扬查森等寺皆献与蔡巴派主理。此亦达喀寺何故今日仍为上部蔡巴派领袖之因由。¹⁵

据此记述看来，达磨索南似乎在机缘巧合之下治好普兰国王的病而得到普兰政权的赏识，其实不全尽然。细绎此文可知，他首先率领弟子进入神山圣湖，但并未在此驻留，而是深入普兰境内活动，为蔡巴派赢得了普遍的声誉。事实上形成了一股王室也无法忽视的宗教势力，然后利用给普兰王治病的机会，使蔡巴派教法得到普兰王室的认同，于是获得普兰政权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在普兰政权的扶持下蔡巴派在阿里地区拥有了一大批寺院，并将达喀寺建为上部蔡巴派的总部，崛起为阿里地区除止贡派以外的另一支举足轻重的教派力量。这为蔡巴派另一高僧多丹云萨微米拉（དོན་པོ་ལྷ་མོ་）

¹⁴ 《红史》，2002：115。

¹⁵ དབང་ཕྱུག་དཔལ་ལྷན། དཔལ་ལྷན་གྱི་མ་དམ་པ་ཚོས་ལེགས་མཛན་ཅན་གྱི་ནམ་ཐང་གི་ཤིང་པར་མ། 9. 10.

གཡུང་ས་བའི་མི་ལ) 将蔡巴派的宗教事业在普兰政权中更上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红史》载：

仁波且（指向蔡巴）的弟子多丹云萨微米拉到六山寨和衣斯（即冈底斯山）等地，米拉住在金刚窟修证一切咒力，作无数利益众生之事业。前往布让王（即普兰王）驻地太索，任布让王父母的内应供喇嘛，由于虔诚敬奉，故布让王父母把黄金献于禅院。布让王父母、僧人和弟子们在米拉死后不久，为其塑造外像和内像。¹⁶

从《红史》的记载来看，多丹云萨微米拉在普兰的地位已有后世萨迦派与元朝的政教关系的重要特征，他所担任的“内供应喇嘛”就是后来元代朝廷中著名的“国师”的先声。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文中“布让王父母”按藏文的习惯不是指的普兰国王的父母，而是对国王和王后的一种尊称。多丹云萨微米拉成为王室的宗教精神领袖。他死后的隆重待遇也表明他在普兰政权的宗教生活中的首脑地位。多丹云萨微米拉与普兰政权的新关系可以说开启了一种政教合作、各得其利的有效模式，王权利用具有精神权威的宗教力量来加强统治，宗教利用政权掌握的社会资源获取各种支持，只是在这里宗教力量教派化了，正如文中所说“由于虔诚敬奉，故布让王父母把黄金献于禅院”的那样，蔡巴派为普兰王室提供的优质宗教服务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因此他圆寂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蔡巴派不断派人接替他留下来的这个内供应喇嘛职位，形成世代相续的王廷教职。

多丹云萨微米拉是蔡巴派在普兰朝廷的第一任内供应喇嘛，考虑到他是向蔡巴的弟子，他在西部地区的活跃年代可以假定为1200—1220年左右¹⁷。多丹云萨微米拉圆寂后，普兰朝廷邀请了第二任内供应喇嘛——楚达瓦（约1220—1240年）到普兰，“护持寺庙、僧人及其弟子”，在普兰的王城太索担任国王的内供应喇嘛，这表明他一方面要主持普兰地区蔡巴派的教务，另一方面还要为普兰朝廷服务，可见他不但是蔡巴派在普兰的教团领袖，也是普兰朝廷的精神导师。蔡巴派在阿里不具有止贡派那样的强大的教团力量，因而容易得到王权的信赖，得以在朝中服务。他在普兰“对别人敬信感戴，终身作无数

¹⁶ 《红史》，2002：119。

¹⁷ 由于蔡巴派的史料不具备明确的历史时间，为了便于理解，只能按正常情况假设每位上师的活动年代为二十年，以下皆是如此推定，这些年代并不具有准确的历史根据，只能把它当作叙述和理解上的工具，不过从后来古格与普兰关系的演变来看，这一推断应当是合理的。

利他之事”。他圆寂后的待遇跟多丹云萨微米拉一样，“施主王父母、僧人及弟子们为其塑造了外像和内像”¹⁸。

事实上，蔡巴派与普兰王廷的这一关系，为西藏社会的政教格局开启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教关系模式。阿里地方诸政权除了的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宗教需求需要这些卫藏教派来为自己服务之外。更重要的是，卫藏教派进入阿里地区成为一股新的权势集团，它不但是有组织的宗教力量，更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在西藏这样一个以宗教信仰为主导的社会中，由上层僧人们组成的僧侣贵族集团势必会为了本身的发展而不同程度地致力于攫取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然而教派集团在阿里面临的处境又与卫藏有所不同，由于阿里地区旧有政权的存在，教派势力不可能像在卫藏那样发展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治实体。但阿里本地政权如果对新进的卫藏教派的宗教地位置若罔闻的话，则又是相当不明智的，所以在西部地区早期教派政治往往是卫藏教派与阿里旧政权结合。因此这一时期尽管受到教派集团的影响，但阿里地区的政教关系与卫藏地区迥异，在卫藏，这一时期的权力格局往往是政教两权分工合作，除极少数情况外，卫藏地区的大多建立起教派政权，尽管这些政权内部往往教权和政权分别由不同的人执掌，但政教两权却集中于同一个世家显贵手中¹⁹。所以其权威虽然分别源自于政教两个中心，但权力却集中于一个集团，可以说具有政教合一、二元分治的特点。

卫藏地区自吐蕃王朝崩溃以后，大小贵族各据一方，量多而势小，教派政权在发展中逐渐取得了强势地位。而十三世纪时阿里地区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教派势力所面对的是比卫藏地区权势更大、地位更高的世俗王权——既有君临一方的权势，又有赞普后裔的神圣身份。尽管教派首领以广结供施之缘这样的既有观念来理解他们与世俗王权的关系，但对王权来说，这一政教关系实乃另有意涵。教派势力虽然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迅速兴起，但仍然要接受王权的领导。世俗政权利用教派力量加强其统治，教派势力则依靠政权力量扩大其影响，形成政以教固，教以政张的关系。这一点与稍后蒙古势力入藏后卫藏各教派面临的局面是一样的。当蒙古入藏同萨迦派结合以后，阿里政权也实现了同噶举派的结合，两个相似的政教关系模式遂在十三世纪中期遭遇，双方于是开始了一场政治与宗教的双边竞赛。

¹⁸ 《红史》，2002：119。

¹⁹ 王献军：《西藏分裂割据时期诸政教合一体的形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1）：7-8。

二、收服三部：蒙元—萨迦势力的崛起与古格—噶举集团的衰落

十三世纪初蒙古崛起，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扶植萨迦派，基本上将政治上分裂割据了四百多年的西藏再次整合到了一起，这一过程对于自吐蕃王朝崩溃以后就处于割据状态的阿里地区而言意义尤为重大。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地区很有可能是蒙古铁骑最早踏及的西藏地方，《蒙古源流》的清译文曰：

岁次丙寅四十五岁，用兵于土伯特之古鲁格多尔济汗。彼时土伯特汗遣尼鲁呼诺延为使，率三百人前来进献驼只、辎重无算，会于柴达木之疆域。汗嘉予之，遂大赉其汗及使臣而遣之，上因致书并赞仪于萨迦察克罗咱斡阿南达噶尔贝喇嘛，云：“尼鲁呼诺延之还也，即欲聘请喇嘛，但朕办理世事，未暇聘请，愿遥申皈依之诚，仰恳护祐之力。”由是收服阿里三部属八十万土伯特人众，遂进征额纳特珂克。²⁰

按成吉思汗四十五岁丙寅为1206年，这时蒙古与西藏之间还隔着西辽、西夏、金等几个民族政权，这个时间蒙古汗国根本不可能对西藏发动进攻，而成吉思汗时代也没有同萨迦派相交结的史料可资佐证，尽管这个故事从时间和人物上令人启疑，但它可能是蒙古人对征服西藏的一种历史记忆，所谓阿里三部，即“阿里三围”，这一说法是后弘期以来藏族地域概念中的习语²¹。看来在蒙古人的历史记忆中阿里地区是最早被征服的西藏地域之一。不过这段资料对蒙古汗国在收服阿里三围后进兵印度的描述，显示此事与蒙古大军的西征有关²²。

事实上，成吉思汗晚年不是没有可能同阿里地区诸割据政权进行接触。1218年蒙古大军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进入西域，曾经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地活动，这些地方都与阿里地区接壤，彼此之间互有交通，藏史上记载，12世纪中叶发生过一次规模较大的噶逻人入侵阿里事件，噶逻军队在古格北部边境的尼贡沟击杀了古格王扎西泽，并将王弟沃巴泽俘获。这时在西域的蒙古军队的一支是完全有可能像半个多世纪前的噶逻

20 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译校：《新译校注蒙古源流》，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158-159。

21 黄博：《试论古代西藏阿里地域概念的形成与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1）：133-134。

22 蒙古与阿里的早期接触，陈庆英先生早前在论述蒙藏民族关系的开端和早期发展时即曾注意到此，参见陈庆英、王守璞主编：《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22-24。

人一样通过南疆地区进入阿里²³。面对强大的蒙古军队，阿里地区的拉达克政权和古格政权的地方头人很可能向蒙古表示归附。可资映证的是，藏文史料也记载了在1219年左右，阿里北部地区有噶逻人和索波王在古格边境聚会。此次聚会还与止贡派在阿里的著名高僧止贡林巴有关，当时他得到普兰王的支持驻锡科迦寺，不久应噶逻大臣辛提白（སེན་ཐིག་ལྷེག）的邀请前往古格北部边境的尼贡（གཉེ་གོང）地方参加集会，得到了盛情款待。期间有所谓的噶逻王和蒙古王（སོག་པོའི་བླ་པོ་པོ）的国师同他见面并会谈佛理，止贡林巴以其高深的造诣折服了所有人，最后获得丰厚的供养而回²⁴。

显然，噶逻禄人在蒙古与阿里的最初接触中肯定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实他们早在蒙古汗国兴起之初就投靠了成吉思汗，蒙古人称他们为“哈刺鲁”。1211年成吉思汗派忽必来那颜征讨哈刺鲁，其首领阿儿斯兰汗本就饱受西辽的压迫，于是决定降蒙反辽，杀死西辽少监，归附了蒙古汗国，阿儿斯兰汗亲自朝见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他主动来归，还把一位家族的姑娘嫁给了阿儿斯兰汗²⁵。有了噶罗禄人作向导，蒙古军队自然具备了进入阿里边境的军事能力。此外引人注目的是，第一次西征期间，蒙古人对阿里地区已相当熟悉，成吉思汗曾和大将郭宝玉讨论进取西藏可能性，“帝将伐西蕃，患其城多依山险，问宝玉攻取之策，对曰：‘使其城在天上，则不可取，如不在天上，至则取矣。’帝壮之，授沙马都镇抚”。²⁶依山筑城的城堡统治是吐蕃时代已形成的一大政治特色，不过当时卫藏地区大部分已成为教派政权的天下，中心寺院已取代城堡成为各大势力的政治核心，只有阿里地区的世俗政权仍然大规模地延续着这一传统。

蒙古第一次西征期间在中亚及北印度一带声势浩大，如克什米尔的奉佛世族斡脱赤兄弟在此后不久就离开故土投效了窝阔台，当时他们的一番议论颇能显示出蒙古西征对印度北部山地诸邦的威慑，“世道扰攘，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盖往归之。”²⁷克什米尔与阿里地区的拉达克仅一山之隔，是印度和中亚通往西藏以及新疆的交通要道，拉达克自然也易极受到蒙古军队的骚扰。因此在蒙古军队大军压境之下，拉达克和古格西北部的一些地方头人是很有可能暂表归附。故而稍后的蒙古西征军中才会有吐蕃部队参加。1225年随哲别参加西征的郭德海在班师途中即遭遇了一支吐蕃部队的兵变：

23 参见黄博：《畏惧噶逻：西藏古格王朝与西藏葛罗禄的传说与历史》，《藏学学刊》第9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156-157。

24 འཕྲི་ཁུང་རིན་ཆེན་ཕུན་ཚོགས། འཕྲི་ཁུང་གླིང་པ་ཤེས་རབ་འབྱུང་གནས་ཀྱི་རྣམ་ཐར། བོད་པའི་མཐུན་ཚོགས། 1985: 9 23-24.

25 拉施特著、余大均等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47。

26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9《郭宝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3521。

27 《元史》卷125《铁哥传》，1976：3074。

从先锋柘伯西征，渡乞则里八海，攻铁山，衣帟与敌军不相辨，乃焚蒿为号，烟焰漫野，敌军动，乘之，斩首三万级。逾雪岭西北万里，进军次答里国，悉平之，乙酉，还至崢山，吐蕃帅尼伦、回纥帅阿必丁力反，复破斩之。²⁸

这段材料表明早在 1220 年代就有吐蕃军队加入蒙古军团作战。从时间上看，这时蒙古军中的吐蕃帅尼伦极有可能就来源于阿里拉达克的头人。通常认为，蒙古势力正式入藏是在 1240 年以后²⁹，也就是说蒙古与阿里地区接触比卫藏地区早了十多年，不过这一接触并不深入，也没有持续下去。而稍后随着蒙古贵族对西夏故地和金国河西地区的占领，才展开了对吐蕃诸部的经营，首先将蒙古影响力正式扩展到卫藏地区的是阔端。阔端是阔窝台大汗（1186—1241 年）的次子，窝阔台即位为蒙古大汗之后，将河西重镇凉州一带作为阔端的封地，而且还将西夏故地和原金国的陕甘地区的军政全权都交给了阔端执掌。1236 年蒙古三路征讨南宋，阔端就是以陕甘军事力量为主体的西路军的统帅³⁰。阔端长期驻守河西地区，与安多藏族有一定的接触，1239 年征讨南宋的战争结束后，他派出部将多达那波率军进藏，为蒙古征服西藏探路。

西藏的政教势力遂在 1240 年首次与蒙古军队正面遭遇。《贤者喜宴》记载，铁鼠年（1240 年）蒙古汗国从北方阔端统治之地派出以多达为将军的蒙古军队第一次抵达吐蕃境内。蒙古军在多堆、多麦、索曲、热振等地方见人便杀，给热振寺造成了重大破坏。达隆寺因为被雾罩住，没有看见才得以幸免，杰拉康寺被焚毁，索敦等五百僧众被杀。止贡寺的京俄扎巴迥乃（གཞགས་པ་འབྲུང་གནས། 1175—1255 年）降下石雨，故止贡寺未遭损害。但是蒙古人要京俄扎巴迥乃去当受供喇嘛，京俄暗示蒙古人西方有一个适合当受供喇嘛的人，让蒙古人去迎请萨班。同时又鼓动萨班为了整个西藏的利益去蒙古。于是在木龙年（1244 年）迎请萨班（ས་སྐྱ་པ་རྩི་ཏ་ཀུན་དགའ་བྱུང་མཆོན། 1182—1251 年）与他的两个侄子，十岁的八思巴（འཕགས་པ་སྒོ་ཤོས་བྱུང་མཆོན། 1235—1280 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ཕུག་ན་རྩི་རྩེ། 1239—1267 年）到止贡寺，献上礼物，资送他们前往阔端驻地³¹。从蒙古军队首次

28 《元史》卷 149《郭德海传》，1976：3522。

29 目前学术界基本一致认为蒙古与西藏的首次正式接触在 1240 年代，相关论证以日本学者冈田英弘（1962 年）以蒙文资料和美国学者 Turrell V. Wylie 以藏文资料进行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参见 [日] 冈田英弘著，邓锐龄译：《蒙古史料中的早期蒙藏关系》，《民族史译文集》（第 4 集），1978：31-47；[美] 怀利著，邓锐龄译：《蒙古初次征服西藏史实再释》，《民族史译文集》（第 4 集），1978：1-30。

30 胡小鹏：《略论元代河西的阔端系诸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1）：54-60。

31 དཔལ་བོ་གཙུག་ལག་ཟེང་གི་ཆོས་འབྲུང་མཁས་པ་འཇི་དགའ་རྟོན། བེ་ཅིང་། མི་རིགས་དཔེ་སྟར་ཁང་། 2006：ཤ 726。

进藏以及西藏各方的应对来看，蒙古贵族最初属意的并不是后来被元朝中央授权管治西藏的萨迦派，而是噶举派。

蒙古军队进藏后，噶当派的主寺热振寺和杰拉康寺遭到重创，而噶举派的达隆寺和止贡寺未受兵祸。此点值得注意，蒙军入藏后战略方向主要集中攻击当时分布范围最大但并未形成政治实体的噶当派，而对拥用广泛的教派政权的噶举派则不予杀伐。除了噶举派诸支颇具实力外，恐怕也与噶举派极具向外传教的热情有关，事实上噶举派除了大举西进，在阿里地区弘法外，也积极东进，在蒙古周边的西夏、河西一带十分活跃，甚至有可能很早就蒙古本地传过教。据《贤者喜宴》记载，在成吉思汗登基三四年后，就有蔡巴噶举派的高僧藏巴董库巴（གཙང་པ་དྲུང་ཁུ་པ་）率领徒众七人到蒙古传法，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并在蒙古攻入西夏后出面保护当地的寺院³²。而前文还提到1219年时在阿里的止贡派高僧止贡林巴（འབྲི་གུང་ལྷིང་པ་ཤེས་རབ་འབྱུང་གནས། 1187—1241年）曾与蒙古人有过聚会，因此蒙古贵族在热振之战后要求当时的止贡寺寺主京俄·扎巴迥乃去做“受供喇嘛”，参加和谈。不过扎巴迥乃最初似乎并不愿意归附蒙古贵族，据其后人绛曲坚赞回忆，热振之战后，扎巴迥乃仍试图组织噶举派继续抵抗，不过这一计划可能很快就失败了，因为当时实力较强的止贡噶举派的第二任贡巴——释迦仁钦（ཤུག་རིན་ཆེན་）随即被俘，“多答逮捕了贡巴释仁，准备杀害之”³³。贡巴全称“本萨贡巴”（དཔོན་ས་གློ་པ་），又称“贡钦”（གློ་ཆེན་），是秉承止贡派座主旨意，掌管止贡地区行政事务的最高官员，此职后来还与止贡万户长和乌斯藏宣慰使捆绑在一起，是止贡派中世俗权力的执掌者³⁴。贡巴释迦仁钦被俘后，扎巴迥乃不得不亲自出面与入藏蒙军主帅多答交涉，贡巴获释，并最终达成归附蒙古的协议，扎巴迥乃把象征西藏统治权的“装有木门的户口名册”献给了多答³⁵。这再次表明蒙古贵族最早寻找的统治西藏的代理人并不是萨迦派，然而对于蒙古贵族提出的要扎巴迥乃前去当受供喇嘛，前往内地朝觐蒙古汗廷的要求，他却心存疑虑，暗施小计地将这一任务交给了萨迦班智达。

扎巴迥乃是止贡派创始人止贡巴·仁钦贝的弟子，当时正担任止贡寺的寺主，此外他还出身于山南地区最有势力的世俗贵族——朗氏家族，同时又具有帕竹噶举派的教派首领地位，身兼要职、位高权重的扎巴迥乃自然不愿离开卫藏前去内地，何况与蒙古谈

32 藏文原典：མཁའ་འབྱུང་མཁའ་པོ་འཇམ་དཔལ་ལྷན་དུ་བྲིས་པ། 2006: 9725.

33 大司徒·绛曲坚赞著、赞拉·阿旺、余万治译、陈庆英校：《朗氏家族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69。

34 参见王献军：《止贡“贡巴”小考》，《中国藏学》，1998（4）：40-41。

35 《朗氏家族史》，2002：70。

判随时还有失败的危險。于是他才向蒙古人推荐了萨迦派的萨班·贡噶坚赞，扎巴迥乃没有想到的此举竟然促成了萨迦派和蒙古贵族之间政教合作，形成了后来的萨迦派接受蒙古的领导，而蒙古贵族则成为萨迦派的信徒，并让萨迦派负责招抚西藏各政教势力接受蒙古统治的新局面，萨迦派遂从大蒙古国权贵手中获得了组织西藏地方政府的授权。这样一来萨迦派的势力开始迅速膨胀，这恐怕是扎巴迥乃所始料未及的。不过萨迦派最终取得西藏的领导权还是经历了一些曲折。而这一时期噶举派的优势仍在，除前述的蔡巴派在普兰获得类似国师的地位之外，此时的止贡派在古格的弘法事业也打开了新的局面。

经过十三世纪初的三次西进弘法，加上古雅冈巴和止贡林巴两位杰出的宗教活动家的努力，止贡派在阿里地区成为首屈一指的教派势力。1239年在卫藏教派首次遭遇蒙古军队之际，主持止贡派阿里僧团的第一任多增古雅冈巴圆寂，尼玛贡巴（*ཉི་མ་གླུང་པ་*）随及出任第二任多增，在他的领导下，止贡派进一步地扩大了同阿里诸政权之间的政教关系，特别是与阿里地区实力最强的古格王室建立起了供施关系，《冈底斯山志》记载：

其后，多杰增巴尼玛贡巴至。古格王赤扎西旺秋（*ཁྱིམ་གྱིས་དབང་ཕྱུག*）、贝衮德（*དཔལ་མགོན་ལྗེ*）父子从请教法，乃以普兰噶尔东（*དཀར་རྩུམ*）之玉浦（*གཡུ་ཕྱུག*）、帕白铺（*པར་པད་ཕྱུག*）、达却铺（*ཐད་འ་ཚོས་ཕྱུག*）等处及萨垅（*ཟུང་*）上下等地献上，遂为远声寺之教产。³⁶

古格王父子从尼玛贡巴请受止贡派的教法，也就是意味着古格王室成为止贡派的信徒，止贡派则将运用其宗教实力为古格政权提供各方面的精神支持；同时止贡派则从古格政权那里获得丰厚的经济支持，这样世俗政权与教派集团在阿里地区实现了强有力的联合。事实上古格政权与止贡派在这时建立联盟绝非偶然，可能正与双方都在这一时期不得不面临蒙古大力经营卫藏及萨迦派迅速崛起的压力有关。

1246年萨班一行抵达凉州，很快取得了阔端的信任，双方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西藏在政治上接受蒙古的领导，蒙古则承认西藏现有的各政教势力的既得利益不受侵害。随后萨班写信回西藏要求各地方世俗政权和教派势力归顺蒙古，此信就是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阿里善知识大德及众施主的信》，值得注意的是，萨班奉命招抚的对象除了卫藏地区的政教首领外，还把割据上部地区的阿里王系诸政权也包括在内，

36 *གངས་ཟིའི་གནས་བཤད་ཤེས་དཀར་མེ་ལོང་།* 1992: 959.

信的开头即点出了招抚的对象是“卫、藏、阿里各地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³⁷。可见尽管1240年蒙军入藏只在卫藏地区有所行动，但蒙古贵族并不认为可以在他征服西藏的大业中将阿里地区置之度外。

跟卫藏地区主要由教派政权控制不同，阿里地区诸政权都是吐蕃赞普的后裔，继承了吐蕃时代的世俗王权政治，其割据统治已在这一地区持续了三百多年。比起卫藏的教派首领来，要这些王室首脑主动归顺蒙古人自当更加困难。何况此时阿里地区的实力因古格的中兴而大大增强，因此阿里诸政权对是否归顺蒙古举棋不定，试图抵制蒙古势力和萨迦派染指阿里。故而萨班在信中特别叮嘱了阿里地区所在的上部地方要尽快下定决心归顺，他在信中威胁道：

前此数年，蒙古兵未至上部地方，由我率白利归顺，因见此归顺甚佳，故上部阿里、卫、藏等部亦归顺，复又使白利诸部输诚。故至今蒙古未遣军前来，亦已受益矣，然吐蕃之上部诸人有不知此情者。其时有口称归降，但所献贡品不多，未能取信而遭兵祸，致使人财尽失，此事想尔等亦有所闻。与蒙古交兵者，欲想以其地险、人勇、兵众、甲坚和娴熟箭法等而能获胜，终遭覆亡。³⁸

看来卫藏地区对归顺蒙古已无异义，而上部地区，也即阿里诸政权则颇不愿意。事实上，十三世纪中期前后阿里地区的政治形势也确实有一定的实力同蒙古对抗，当时因南北分裂而衰落了将近百年的古格王国在国王扎巴德（ཀླུ་པ་ལྷེ། 1230—1277年）的领导下完成了统一，实力迅速增长，一度崛起为西部地区的新霸主。扎巴德上台后励精图治，不但结束了古格的南北分裂之局，还将控制的地区扩展到普兰一带。同时还积极向外开拓，首先打通了阿里和印度、尼泊尔的商路，通过发展对外贸易而使国家经济实力大增，然后出兵攻占了甲龙、尼蒂、冲尼、让南、桑旺和阿如等地，迫使库须局库向古格进贡，古格一跃而成为西藏西部乃至西喜玛拉雅地区的霸主³⁹。古格新开拓的地区相当于今天印度境内的库马翁、加尔瓦尔、库奴一带，这些地方在近代也是印度与西藏的主要商路，因此扎巴德控制这一地带就意味着获取了印度和西藏之间的商业贸易的巨大利

37 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等译注：《萨迦世系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88。

38 《萨迦世系史》，2002：89。

39 ཁུ་གེ་མཁན་ཆེན་དབང་ཀླུ་པ་ལྷེ། མངའ་རིས་རྒྱལ་རབས། རྩ་ལིང་གཙུག་ལག་ཁང་ལོ་གཅིག་ལྷོང་འཁོར་བའི་རྒྱུ་མཐའ་དཔྱད་གླེང་གི་སྒྲིག་ཚགས་རྒྱུང་། 1996: 478.

润，这无疑会使古格政的国力更加强盛。蒙古结合萨迦派试图控制全藏，面对其咄咄逼人的形势，古格政权在加强军事、经济实力的同时，还不得不寻找新的应对之策。

面对蒙古以军事压力结合萨迦派的宗教诱服，古格政权不得不加紧利用阿里地区早已形成的政教关系资源。此时藏传佛教三大派中，萨迦派正在为蒙古整合西藏各势力，从而扩大自身的实力，是阿里世俗政权的直接对手。噶当派分布虽广，但未建立起有力的教派政权，且在蒙军入藏之初遭到残酷打击，早已顺服，古格已无借重他抵制蒙古与萨迦派势力进入的可能。只有噶举派既拥有众多的教派政权，又在蒙军入藏之初未受到军事打击，实力尚存，虽然已经归顺蒙古，但并不甘心接受萨迦派的领导，且其支系教派中的止贡派、蔡巴派还与阿里地区诸政权有广泛的政教合作关系，自然成为古格政权在抵制萨迦教派集团以及蒙古势力进入阿里的天然同盟军。特别是稍后蒙古国内的政治变化，使得萨迦派的扩张力量一度减弱，双方暂时达到了势均力敌的状态。

1248年阔端的兄长贵由汗驾崩，此后汗位转入托雷一系手中。之前西藏地区一直处于阔端的监控之下。蒙哥汗（1249—1259年）即位后为削弱阔端一系的势力，遂重新安排西藏各教派与蒙古宗王的结合格局。《汉藏史集》记载，拖雷的长子蒙哥汗与止贡噶举派结为施主与福田，次子额沁哈丹与萨迦派结为施主与福田，第三子忽必烈与蔡巴噶举派结为施主与福田关系，第四子阿里不哥与噶玛噶举派结成施主与福田，第五子旭烈兀也与止贡噶举派结成施主与福田⁴⁰。这样一来噶举派实力大增，特别是止贡噶举派实力大增，不但成为蒙哥汗的直属教派，更是旭烈兀的封地，实力大增。同时对阿里地区而言，更重要的是蒙古汗廷宣布将阿里的部分地区划归与止贡派关系最为密切的帕竹噶举派管理，帕竹派还在这一地区委任官员，“蒙哥汗的封诰中规定帕木竹巴的领地上自阿里的郭润砣，下至波日拉山脚。在委任南萨拔希为长官后，我们始领有”⁴¹。既然噶举派诸支的既有权力已经得到蒙古朝廷的承认，于是，这一时期古格的策略便是借助在阿里地区的止贡派、蔡巴派等噶举派的力量，阻止萨迦派势力染指古格，进而抵制蒙古势力的进入。

在古格势力进入普兰前，普兰王室与阿里蔡巴派的关系已相当巩固，当时普兰的蔡巴派首领是第二任内应供喇嘛楚达瓦的继任者——喜饶贝瓦（ཤེས་རབ་འཕེལ་བ། 约1240—1260年），史称“由其护持寺庙、僧人和弟子们，于太索任施主王父母的应供喇嘛”。他任职期间，取得了普兰政权宗教首领的地位，普兰王将著名的大译师仁钦桑波修建的大

40 达仓宗巴·班觉桑波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38。

41 《朗氏家族史》，2002：72。

金堂和四座经堂都奉献给了他。喜饶贝瓦在普兰也“作无数利益众生之事”。他死后跟前两任一样，也由国王和王后、蔡巴派的僧众和他的弟子为其塑造外像和内像以资纪念⁴²。喜饶贝瓦之后，普兰王室又邀请了第四任内供应喇嘛——桑杰沃色瓦（སངས་བྱུང་འོད་ཟེར་བ། 约1260—1280年）来普兰，“护持寺庙、僧人、弟子和施主，于太索任施主王父母的应供喇嘛，并为施主王父母和君臣们灌顶”。古格征服普兰，大约就在桑杰沃色瓦时期，《红史》提到他后来又接受了古格王的邀请，为古格王父母和君臣们施行灌顶仪式。古格政权继续让他担任供应喇嘛，古格王还接受蔡巴派的灌顶。

这表明，在征服普兰后，古格王室遂延续了以前普兰王室统治时期的方针，继续维持与蔡巴派的供施关系。蔡巴派仍然在朝廷中发挥作用，古格政府也继续给予蔡巴派丰厚的经济支持，据说桑杰沃色瓦在古格“得到无数布施，故发展众僧，壮大其事业”。之后他再次回到普兰的政治中心太索，继续主持蔡巴派在阿里地区的教政，“此后他又返回布让王驻地太索，为僧众做了无数善事”。可以说桑杰沃色瓦在位时将蔡巴派在阿里地区的声势推向了顶点。古格政权与蔡巴派结合后，给予大力扶持，使蔡巴派的实力迅速增强，据称桑杰沃色瓦在任后期，主持修建了包蚌寺、却龙寺、麦措寺和玛龙寺等寺院，此外他还将在阿里地区得到财物送回蔡巴派在卫藏地区的主要寺院，因此成为享誉西藏的高僧，“喇嘛桑杰沃色瓦把以经典为主的宝贝和财物赐给达喀寺，同时亦把经典、宝贝和财物赐给蔡（即蔡巴寺）贡（即贡塘寺）和拉秋寺，故喇嘛桑杰沃色瓦的名声遍布堆、蔡地方，他是一位深受敬信爱戴的僧人”。⁴³

而对于在阿里地区拥有庞大僧团且建立基地的止贡派，扎巴德则下了更多的功夫。他不但延续了古格上一代与止贡派的供施关系，还使古格与止贡派的结合更加紧密。扎巴德进驻普兰后，在军事要塞杰蒂城召见了第三任止贡多增衮噶坚赞，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政教联盟：

其后，多杰增巴衮噶坚赞（ཀུན་དགའ་བྱུང་མཚན་）至，古格国王扎巴德（གཤམ་པ་ལྷེ་）及王后拉坚桑珠（ལྷ་ལྷམ་བསམ་གྲུབ་）父母迎请尊主至普兰杰蒂城（བྱུང་ཉི་མཁར་），听受教法，乃献上普兰塘野（ཐང་ཡལ་）上下等处，以为供养。⁴⁴

42 《红史》，2002：119。

43 《红史》，2002：120。

44 གངས་ཟིའི་གནས་བཤད་ཤེལ་དཀར་མེ་འོད་། 1992: 959.

杰蒂城是普兰王室统治时期的一个中心城堡。相关研究表明，扎巴德在西部地区建立霸权大约在 1260 年代⁴⁵，因此衮噶坚赞担任止贡多增的时间也应该在 1260 年前后。为了增强古格在宗教上对抗蒙古—萨迦势力的实力，扎巴德除了整合阿里境内的噶举派力量之外，还积极与止贡派在卫藏的总部——止贡替寺结交，《阿里王统记》记载，扎巴德在位之时曾向止贡寺寺主古鲁达磨热查（གུ་རུ་གླམ་རྒྱལ་མཚན།）敬献了一百名童子和大量的财宝，对止贡派表示出超乎常礼的尊崇，他还向这些供献品跪行了一百次的敬礼⁴⁶。扎巴德以非常之礼进一步使古格在卫藏噶举派中形成了良好的声誉。

在一背景下，止贡派在阿里的实力也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提升，据说在第四任止贡多增——达磨坚赞（དར་མ་རྒྱལ་མཚན།）时期，止贡派在阿里地区的势力达到历史上的极盛时代，止贡派在西部地区的修行者和寺院遍布阿里各地，形成了以冈底斯山为中心，以远声寺为总部的止贡派西部地区势力网络。据说此时止贡派的修行僧人遍布阿里三围的千山万谷，僧众已达千人之数。同时止贡派在西部地区的寺属产业也相当庞大，仅主寺远声寺的属寺就包括：娘日、珠楚浦、日波泽给、列米蒂钦、列米衮宗、蒙日措、多波喜多杰宗、洛曲米嘉扎、加野益西宗、卓雪江浦、扎黎杜、普兰贵扎、普兰科迦寺、普兰香长白乌、普兰查嘎热、库奴桑丹却林⁴⁷。《冈底斯山志》记载，达磨坚赞时期，止贡寺的寺主为迥仁波且（གཏུང་རིན་པོ་ཆེ།）。按迥仁波且本名多吉扎巴，是止贡寺的第四任寺主，他于 1255 年就任止贡替寺的寺主，此后一直担任此职直到 1278 年病逝为止⁴⁸。因此达磨坚赞时代大约在 1270 年代。

十三世纪中后期，阿里地区在古格国王扎巴德的领导下，联合噶举派以抵制萨迦派，不单使阿里地区暂时经抵受住了蒙古势力的威胁，也使蔡巴派和止贡派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不过古格—噶举派联盟的短暂繁荣在十三世纪末遭到蒙古—萨迦势力的有力反击，最终以元朝的胜利——实现了对阿里地区的有效统治而结束。正当扎巴德在古格开启了其中兴大业之际，蒙古朝廷的权力斗争也逐渐因忽必烈的胜出而平息。1260 年以后，由于萨迦派的新领袖八思巴同蒙古的新大汗忽必烈的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蒙古国和稍后元朝政府对萨迦派授予管理西藏的全权，凭借蒙古贵族和中央政府的支持，萨迦

45 Roberto Vitali, *The Kingdoms of Gu ge Pu hrang, According to Mnga' ris rgyal rabs by Gu ge Mkhan chen Ngag dbang grags pa*, Dharamsala: Tho ling gtsug lag khang lo gcig stong 'khor ba'i rjes dran mdzad sgo'i go sgrig tshogs chung, 1996: 441.

46 མངའ་རིན་པོ་ཆེ་འབའ་པོ། 1996: 78.

47 གངས་རིའི་གནས་འགྲོ་ཤེས་དཀར་མེ་ལོང་། 1992: 59-60.

48 参见直贡·丹增白玛坚参著、克珠群佩译：《直贡法嗣》，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98-101。

派势力迅速膨胀，开始将注意力转到了阿里地区。

1265 年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返回西藏，随即试图将帕竹派所控制的下部阿里地区纳入到萨迦派的控制之下。萨迦派召帕竹派将这一意图宣布后，遭到帕竹派的坚决反对，他们说：“纳噶孜是止贡万户的领地，萨迦派拿去后，止贡派会不悦的，虽说阿里人是我们的属民，却是门生关系，供施关系，不忍舍弃，不愿调换”。由于当时古格和止贡派的实力较盛，萨迦派的意图一时未能实现，直到后来萨迦派施计毒杀了帕竹派委任的下部阿里长官南萨拔希后才得到了这一地区的控制权，“南萨拔希丧生后萨迦派掌管了阿里万户”。⁴⁹当时下部阿里地区处于吐蕃赞普后裔贡塘王朝的统治之下，萨迦派取得对阿里贡塘王朝的管理权后，贡塘王朝也就成为萨迦派控制古格的先锋，逐渐向阿里地区渗透。最终元朝在萨迦派的宗教支撑和蒙古的军事力量的有力支持下，最终实现了对阿里地区的有效控制。关于这一过程，史料极为稀少，有些史书偶有提及也大多语焉不详，不过综合各种材料，基本上可以看到十三世纪末叶古格——噶举派联盟的失败和阿里地区被元朝纳入治下的事实。

据贡塘王朝的史书记载，在萨迦派的指挥下，萨迦贡塘联军一度率军进入普兰，在普兰的噶尔东修筑城堡，噶尔东事实上成为监控阿里地区的总部⁵⁰。这次军事胜利造成了古格中兴事业的终结。《阿里王统记》载，扎巴德在他的文治武功达到鼎盛之时突然离世，“阴火牛年（1277 年）薨，时年四十八。”⁵¹可能由于扎巴德的猝死，导致了古格在军事上的大败；也可能是这次大败造成了扎巴德的突然离世，无论如何扎巴德在这个时候死去使古格的实力迅速衰落。更令人值得注意的是，蔡巴派与止贡派在阿里的弘法事业也都不约而同地在他们刚刚才取得了辉煌业绩的第四代阿里领导人时期，突然中断。《红史》记载的蔡巴派普兰内供应喇嘛的谱系也就在第四任喇嘛桑杰沃色瓦时结束，而《冈底斯山志》记载的止贡多增传承也在第四任多增达磨坚赞后中断了一个较长的时期。

更为重要的是，古格的王统也在扎巴德之后出现了一个断裂期。尽管《阿里王统记》记述扎巴德死后其子南杰德继位，但是结合南杰德生平的其他资料，他事实上出生于 1372 年，也就是说古格王统在扎巴德后中断了一百多年⁵²。这些迹像表明，阿里地区原有的政教势力在十三世纪末叶遭到了一次近乎天崩地裂式的打击，无论是政治上还宗

49 《朗氏家族史》，2002：72-73。

50 ཀུ་ཐོག་རིག་འཛིན་ཆོ་དབང་ནོར་བུ། བོད་ཆེ་ལྷ་བཙན་པོའི་གཏུང་རབས་མངའ་རིས་སྐད་གྲུང་ཐང་དུ་ཇི་ལྷ་རྒྱུང་བའི་ཚུལ་དེབ་གཏིར་དུངས་གྲལ་འཕྲུལ་གྱི་མེ་མང་། བོད་ཀྱི་ལོ་རྒྱུས་དེབ་ཐེར་ཁག་ལྔ། ལྷ་ས། བོད་ཚུ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ལྷིང་དཔེ་སླུལ་ཁང་། 1990: 9 108.

51 མངའ་རིས་ཚུལ་རབས། 1996: 9 79.

52 *The Kingdoms of Gu.ge Pu.hrang*, 1996 : 451.

教上，原有的政教组织都中断了其发展历程，阿里地区的诸政权看来不得不在其后归顺了蒙古并接受萨迦派对阿里的管治，致使史料残缺，也有可能是后来书写这段历史时故意将这一段臣服于人的历史从史书中抽去，所以才会阿里地区的政治和宗教史上产生出这么大的一段空白期。古格——噶举派势力的衰退在阿里地区留下的权力空白很明显被元朝——萨迦派的新权威所取代。

《汉藏史集》的记载也为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元朝中央政府和萨迦地方政府确实对阿里地区一度取得了相当有效的统治权力。1287年元朝中央派出大员和萨迦本钦一起主持了对西藏的户口清查工作，阿里地区也被列入到这次清查工作中，“上部纳里速古鲁孙（即阿里三围），普兰是被雪山围绕，古格是被石山围绕，芒域是被河流围绕，这几处算起来，有二千六百三十五户”⁵³。同时元朝在西藏推行驿站制度，在阿里地区也设置了驿站，并让当地负责供应驿站运转的劳役和费用，“玛法木地方（即玛旁雍措）的小站由普兰人支应，古格南北两路的小站，由梅朵色如人支应管理”⁵⁴。这些记载表明元朝政府不但能够在阿里地区清查户口，建立驿站，而且还可以征派赋役，可见元朝中央政府和萨迦地方政权对阿里地区所拥有的并不是名义上的统治权而是可以相当有效的行使这种权力。随着统治的稳固，1292年元朝中央正式在阿里设置军政机构——纳里速古儿孙路宣慰使司，隶属乌斯藏、纳里速古儿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⁵⁵。纳里速古儿孙即“阿里三围”的音译，同时还编制了纳里速古儿孙元帅二员⁵⁶。

而在宗教上，稍后萨迦派在元朝的支持下给止贡派在卫藏的总部予以了最严重的打击，最终取得了对西藏各教派的绝对优势。1290年忽必烈派出皇子铁木儿不花率领元朝大军进藏，与萨迦本钦阿迦仑会合，攻陷止贡替寺，并将该寺的大殿焚毁，僧俗被杀总计达一万人以上，藏史将这一事件称为“止贡林洛之乱”⁵⁷。随着阿里地区传统优势教派——止贡派的衰落，萨迦派逐渐成为阿里宗教生活的重要内容。考古发现古格王城遗址佛殿中有多处萨迦派祖师的画像，在王城红殿、大威德殿和坛城殿的壁画中均绘有“萨迦五祖”第一祖衮噶宁波的画像，在坛城殿的壁画中则有萨迦三祖扎巴坚赞和著名的萨班的画像⁵⁸，这表明萨迦派已经进入到了古格王室的精神生活中。

53 《汉藏史集》，1986：164。

54 《汉藏史集》，1986：166。

55 《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纪》，1976：367。

56 《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1976：2198。

57 张云：《元代西藏止贡之变及相关问题考释》，《中国藏学》，2000（3）：38-50。

58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古格故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12。

十三世纪初藏传佛教噶举派各支经历了持续发展的繁荣后，大多起建立教派政权，并积极向外弘法拓展，然而当新兴的教派势力与颇有实力的世俗政权相遇时，情况与卫藏地区就大异其趣了。当止贡派、蔡巴派与阿里地区传统的赞普后裔诸政权相遇时，当萨迦派等各派与蒙古相遇时，尽管宗教首领们可以用各结供施之缘来理解其政教关系。但是在王权主导下开启的政教合作——政以教固，教以政张，已经为卫藏地区的政教传统注入了新的因素。教派势力成为王权治国理民而不得不加以借重的重要力量，更为世俗政权升华其驭众之术，在强化王权之威，开拓权力之域上，增色不少。可以说元世祖在八思巴圆寂授予的赐号中的藻饰——“开教宣文、辅治大圣”一语⁵⁹，正好道出了此中的奥妙。蒙元势力的进入，进一步地刺激了王权与教派势力的结合，蒙古—萨迦势力的步步进逼与古格—噶举集团的突然衰落，最终实现了元代对西藏的统一。然而无论胜负，双方所使用的策略却基本相同，显示出这一时期政教关系的大趋势。

◆ 黄博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

⁵⁹ 《元史》卷二百二《释老志》，1976：4518。